

# 郭沫若研究的新成果

## ——评孙党伯著《郭沫若评传》

秦新文

孙党伯教授所著《郭沫若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以其丰富翔实材料,稳妥公允的立论,充分展示了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文学创作、史学研究、政治活动等各个方面的状况,是一部达到了郭沫若传记研究新水平的学术著作。

评传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立论从对象实际出发的学术研究准则,客观评述了郭沫若光辉、曲折的一生,既不抹杀他的功绩,也不为贤者讳而有意隐瞒他的缺点。如作者写郭沫若经过辛亥革命后,一方面看到他的眼光由个人、学校转向社会,政治视野大为开阔,另一方面又看到,他把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务视为民国的“一线生机”,贬责蔡锷的护国义举,褒扬段祺瑞的“削平大乱”都确实是褒贬失当。同样,作者既充分肯定了《女神》时期郭沫若对革命导师列宁的赞颂,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他把列宁等同于哥尔栋、罗素,是以资产阶级观点理解这位革命的伟人。作者既高度评价郭沫若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又没有忽略他当时还存在一些片面和偏激的错误观点,特别是化名杜荃攻击鲁迅所造成的“极坏的影响”。该书还认为,在两个口号论争的初期,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解释是“精当的”,并无什么偏颇,但当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后,他对鲁迅、茅盾的言行产生了误解,态度遂出现偏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郭沫若成了我们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评传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者认为,解放后,郭沫若对党和党的领袖所提出的政策或指示,总是率先响应的。当这些政策或指示正确时,他的表态就自然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反之,他的表态就会发生不良影响。如五十年代对错误处理胡风、冯雪峰的表态,如热情、真诚地歌颂“大跃进”,以及后来对“九大”、“十大”错误路线缺乏认识而表示拥护等等,都不免明显地打有当时时代的“左”的印记。评传正是这样,对郭沫若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满怀尊崇的感情,又不因此装点或删削历史的真相,这正显示了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

其次,《郭沫若评传》还能做到“传”、“评”结合。“评”由“传”出,“传”是“评”的客观基础,“评”又对“传”起到某种统摄、笼罩的作用,这使全书虚实相间,既显得具体生动,又带有浓郁的理论色彩。而无论是“传”是“评”,都不是静止、孤立地罗列材料和观点,而是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一切,注意把郭沫若放到他身处的社会环境中、放到他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里进行具体的考察、评述。比如作者写早期的郭沫若,既强调孔子、王阳明、李白、王国维等人所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对他的濡染熏陶,强调上新学、读林译小说、特别是留学日本,各种外国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想,诸如民主与科学、泛神论、无政府主义、浪漫主义、马列主义等等对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突出新旧交替时期的社会生活、辛亥政治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对他的磨砺、冲激和鼓舞,作者由此充分描绘出古今中外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如何铸就了郭沫若早期思想的丰富复杂性,有条不紊地梳理出他早期思想中的各种因素、各个侧面。同时,又十分注意各种思想因素在后来的岁月中的相互激荡,消长变化,使人清晰地看到郭沫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来。与此相适应,作者还以“史”的线索勾画出了他不同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演化过程。评传表明,从《女神》到《星空》,诗人的感情由激昂奔突的高峰跌入到了一个彷徨苦闷的低谷,而至《前茅》,则抛弃了“低回的情趣”。它对比《女神》,思想内容有所突进,艺术成就和感人力量又有所不及。到《恢复》,虽然思想、艺术方面还有一定的缺点,而就总的倾向看,它是郭沫若思想实现质的飞跃的一个标志,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无产阶级的诗集。评论历史

剧,作者也注意展示早期《三个叛逆的女性》与抗战时期的六个剧本及解放后的《蔡文姬》的相互区别、承传和转化关系。作者在事实上是把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看待和评述的。总之,评传写郭沫若,力图做到在空间上使传主与整个社会、时代交融相通,在时间上注意传主一生的前后勾连照应,全书有力地烘托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发展着的生命形象,同时也强化了该书的有机整体性,使其内容丰富繁复而不零乱。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郭沫若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同时也仍有许多问题存在着分歧。评传作者并不回避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他能通过独立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使全书由于研究者的独特识见而带来理论上的新鲜感,这是该书又一突出的特点。有关郭沫若的思想转变就是郭沫若研究中长期争执不下的一个难题。有人认为郭沫若思想的根本转变是在“五四”时期,有人认为是在一九二四年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以后,也有人说他翻译这本书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者通过对所占有的大量资料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郭沫若的思想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九二三年发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标志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向无产阶级方向转变,因为该文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如对现存社会的性质及病根的正确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仰,以及对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及创造新文艺途径的看法等等,而作为转变初期,他的思想又显得“相当含混和矛盾”,带有尼采、康德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明显影响。一九二四年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成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作者又指出,仅仅翻译一本并非完全正确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不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经过大革命时代血与火的洗礼,才使他的政治观、哲学观、文学观得以根本转变,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应该说,这种对郭沫若的思想转变过程作系统而有阶段性的具体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又如,有关郭沫若早期的泛神论思想也是一个争论的热点。不少人认为,郭沫若早期是个泛神论者,《女神》的基本思想是泛神论。作者对此经过充分的辨析后指出,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他往往凭着自己的主观印象和需要去解释泛神论,并不着意弄清泛神论的本质,这样,经过他的主观改装过的泛神论与哲学上的泛神论就不是一码事了。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判定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不能笼统地说《女神》的基本思想是泛神论。进而,作者还论述了郭沫若式的泛神论在他的思想及作品所占踞的地位和具体表现,这就使人们对他的泛神论思想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准确的把握。《郭沫若评传》还对素有争议的郭沫若的一些作品作了新的评价。如有人觉得他“五四”时期创作的《笔立山头展望》一诗“错误地歌颂了日本物质文明”,是人们感情上所难以接受的。而评传认为,该诗歌颂现代科学、物质文明是符合“五四”时代精神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欺压胁迫中国的罪因并不在于这物质文明本身,而在于它的制度。这样简明的辨析很能解决问题。值得说明的是,评传不囿成说,有所创新,除了作者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大量占有资料外,还在于他对研究对象有真切的理解。正是由于对郭沫若的“偏于主观”、富于情感的个性特征的把握,作者才能正确判定郭沫若受有泛神论影响而又不是一个真正的泛神论者。同一道理,留学日本之初郭沫若之所以倾心于政治上反动的王阳明,作者认为,并不是因为他赞赏王阳明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立场,而是为了“以彻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也正是由于作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刻的理解,才使他能传其神韵,评述确当。因为理解的本身不仅包含对对象的理性认知,同时还包含与对象的感情上的共鸣,心灵的相通。

据《后记》交待,该书的初稿原是作者六十年代初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由于写作时间拉得长,一方面使作者能从容积累丰富的材料,思虑较为成熟,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使该书所引用的一些材料和某些观点带有过去时期的历史痕迹。如书中对曾经影响过郭沫若的尼采、康德、罗素、无政府主义思想等大都采取过于简单的否定态度,似缺少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又如作者在论述郭沫若思想转变时,往往把他早期强调主观、崇尚天才、景仰个性及其他自由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把重主观表现看成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而贬低、否定,同样显得过于简单化。因为上述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的,不应当笼统地贬低或否定;至于把重主观表现等同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一个人的文艺观与哲学观虽然有所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线性的直接关系,不可将这二者进行简单的类比。郭沫若重主观表现首先是承认人的感情的客观存在并对此表示尊崇,这就很难说是唯心主义的。即使《郭沫若评传》带有这样一些历史的痕迹,但并不影响它对郭沫若研究所作出的新的突破和贡献。